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4)01-0110-(10)

冷战时期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思考

吴永年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 文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既简明扼要又重点突出地论述研究了冷战时期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关系现象。并从印度文化的宗教视角去探讨研究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发展的轨迹及由热变冷的原因,着重分析和研究了冷战时期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关系现象、印度宗教文化的特点、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从而,思考如何更深刻去认识对中印文化关系发展的启示和趋势。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扩大共同的价值观,这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发展理念则是相同的。

关键词: 冷战时期; 中国; 印度; 宗教文化; 关系

新中国刚成立,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什么决定率先承认中国? 印度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又为什么力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 中印两国为什么也就迎来了最亲密的友好期? 为什么好景不长? 还为什么由于中印两国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逐渐恶化,中印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大倒退,直至在1962年中印两国爆发了边界战争? 为什么直至1978年3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友好关系协会会长王炳南率团访印度之后,中印关系才开始解冻? 1979年2月12日,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才步入正常轨道?

如果我们从印度文化的宗教视角去探讨研究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发展轨迹及由热变冷的原因,

以及目前中印关系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贸易、外交及边界中的矛盾与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从更深层次领悟到中印关系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的真正原因。

一、冷战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1944年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指出,“中国和印度通过佛教彼此接近发展了许多交往”。中国与印度各自独立解放建国后,中印两国由于悠久友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十分火热。1951年1月12日,尼赫鲁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我们印度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谊,我们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小矛盾,但当我们回顾那长久的过去,那包含着某些哲理的过去,也有助于我们彼此

收稿日期: 2013-06-20

作者简介: 吴永年,男,上海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兼职教授,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图书馆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印度学与南亚问题研究。

了解。”^[1](P5~6)] 如前所述,中印之间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独立解放建国之前的年代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特点,中印之间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是非暴力的,两国彼此之间都怀着友好与热忱,在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加强了解,并促进了各自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也是世界人类史上的文明之举,它脱离了血与火的争斗,和平地把中印两国的文明推向一个一个更高的阶段。1950 年至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之前,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遵照历史的轨迹延续了下去。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之间最值得一提的文化交流事件有:1955 年 4 月 18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独立厅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印两国首脑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并且认为殖民主义是当今世界不安定的根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是在 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成员时提出的。当时周恩来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得到解决的。”^[2](P92)]

如果从中印文化交流的源头去探究的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源自于佛教的戒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诳语,不饮酒,神圣又至高无上)。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信仰、理念和戒条,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中国文化不断接受,在经过了不断的演化之后,逐渐形成了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

实际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出自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代表团正式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的第 14 条规定“中国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印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1954 年 6 月 27 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初步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即:世界上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

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如果世界各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可能发生一国对另一国进行威胁与侵略,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可能就能变为现实。同时,他建议尼赫鲁“中印两国应该以五项原则给世界树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也欣然赞同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同年 6 月 28 日,中印两国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实基础”。同时还指出“如果接受并按照五项原则办事,任何一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会成为和平的障碍和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毛泽东也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的国家关系中去。”^[2](P97~98)]

当时中印两国总理能极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说明了他们的英明伟大和智慧。二是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印两国领导人少有的勇气和远见卓识,他们也为今后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从长远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将成为推动 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三是它的提出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如果没有中印间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基础,周恩来和尼赫鲁两位总理是不可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国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也不可能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共同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中印文化民间交流的友好使者谭云山。他出生在湖南茶陵下东乡,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事业奋斗了 50 多年,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谊与了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此,在中印两国间享有“现代玄奘”的美言。谭云山酷爱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和宗教等,1927 年他南下新加坡,在那里教授中国历史、哲学及文学等科目。当时,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访问新加坡,谭云山拜会了泰戈尔,泰戈尔为他兼任中印文化

的交流责任而高兴,并邀请他为由其本人创办的国际大学教授中文。1937年在谭云山的努力下创立了中国学院,主要学习研究中印两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等,并进行两国间访问学者的交流。中国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徐悲鸿,以及学者吴晓玲、金克木、杨瑞林等前辈,都曾在中国学院当访问学者,与印度专家学者交流中印文化。1956年11月11日,谭云山与女儿谭文回国观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中国领导人对谭云山有志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成就赞赏,并鼓励他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友谊、了解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其间,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在各个层次上也不断地达到高潮。1951年3月,全印和平大会筹委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爱德华大夫以非官方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不久,全印和平理事会理事潘迪特·森德尔率领非官方高级亲善访华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典礼。同年10月至12月,中国也派出了以著名学者和作家丁西林为团长的文化代表团,对印度进行了为期5周的访问。

1952年印中友好协会在印度成立,并在全印设立了45个分会。同年5月中印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丁西林为会长。这一年有雅拉克希米·潘迪夫人率领的英迪拉·甘地文化亲善访华团,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印度统一工会和印度劳工协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还参加了中国的“五一节”活动。9月,印度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60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另外,在这一年里,印度的《今日中国》出版,为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与了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3年前来中国访问的印度代表团更多,其中有印度劳工代表团、全印总工会代表团、加尔各答大学代表团、印度艺术代表团、印度青年代表团和印度全国职工大会代表团。7月26日,毛泽东观看了由萨钦·禁·古普塔率领的印度艺术代表团在北京的演出,还接见了艺术代表团的成员。一时间,由印度诗人查托巴·迪雅亚创作的《中印友好之歌》,在中印大地上传播开来。12月,丁西林率领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参加了

在新德里召开的印中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会议,全国性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

1954年,中印文化交流更是显得繁忙与热闹。在这一年里,中国派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相继访问印度。印度访问中国的代表团更多,各种各样的代表团纷纷踏上中国的领土,各方面的名人专家和中国各界的专家学者热烈交流,增加友谊。也在这一年里,尼赫鲁访问中国,为期12天的访问使尼赫鲁对中国有了一个初步、模糊的认识。也正是这个初步、模糊的认识,造成了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完全性和不正确性,使他日后对中国的判断产生了错误认识和决策。

1955年后,中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双方扩大了留学生的交换计划,每年中印双方为各自所在国的留学生提供10名学生的奖学金。在这一年里,中印之间的电影代表团互访,印度的电影在中国20个大城市举办电影周,印度电影《两亩地》和《流浪者》在中国拥有了300多万观众,在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形象与有益的教育。另外,中印体育代表团互访、中国卫生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印度、印度文艺代表团在各地的演出,使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了既迷人陌生又美妙的印度舞蹈音乐;印度还在北京举办了阿旃陀壁画1500周年纪念会和印度艺术品展览会。中国也在新德里举办了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同时双方的艺术家对中印两国的舞蹈、绘画、壁画及艺术品等艺术进一步进行了交流与研究。自1956年至1959年之间,中印文化交流热闹非常。但是,从1959年以后,由于中印关系逐渐变冷,中印之间文化交流也日渐减少;直至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完全终止。

从这一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中印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化交流高潮,是在中印两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受尽殖民者压迫与剥削的中印两国人民,在各自独立解放建国后,两国的领袖与人民要急于了解自己邻居的各方面情况。二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民间的热情要高于官方层面。中印两国人民以少有的热情欢迎着双方的代表

团,其欢迎的场面往往有数十万或上百万人参加。中印两国是兄弟的呼声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这是发自两国人民内心的呼唤,其中没有半点的虚伪之情。三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多于政治方面的接触。其原因是两国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虽没有产生抗争,但是,各自都有一种对自己所选择的社会制度莫名的自重心态。所以,文化交流多于政治层面的交往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从某一个角度看,这也为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埋下了祸根。因为,中国与印度都不甚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大党的特点?其追求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印度的政治体制有何区别和特点?中印双方对各自的邻居有何企求?其真正的深层次的意义和原因在何处?以致最终在对中印边界纷争的事态发展和结局上失去了正确的判断与决策。这对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说是不幸的,由此中印关系的良好发展到1962年终止。直至21世纪的今天,中印边界还没有找到两国都认可的公平、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方案。

二、冷战时期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关系现象

众所周知,印度领土与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接壤,中印边界线长达2000多公里。自古以来,印度与西藏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更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印度宗教与西藏宗教的关系更加密切。历史上印度佛教对外传播的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是北上我国的青藏地区,另一条是东下东南亚各国。印度佛教北上西藏地区之后,长期与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喇嘛教便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了苯教的一些神祇和仪式,教义上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俱备,尤重密宗,并以无上瑜伽为最高修行次第,形成‘藏密’。”^{[5] (P1162)}喇嘛教亦称之为藏传佛教。

确实,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长年累月,印度的宗教文化对西藏地区的影响之大显而易见。我们无可否认,也不用否认西藏文化与印度文化有着更多的、直接的亲近关系,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最为巨大。历史上印度的

许多高僧亲赴西藏传教,其中以莲花生大师和阿底峡尊者最为著名。西藏的僧侣也纷纷前往印度学法取经,其中以玛尔巴、宗喀巴和米拉日巴大师最富有盛名。久而久之,佛教信仰已成为藏族人民的最高精神支柱。13世纪以后,在元朝政府的扶持下,藏传佛教的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区政权,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因此,无论在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还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的尼赫鲁政府期间,他们要染指西藏,首先都须从宗教文化方面着手。早在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次大陆后,它就企图把西藏变成“缓冲国”,从而挑起西藏独立脱离中国。1774年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派乔治·波格尔与亚历山大·哈莱尔博士,以东印度公司代表的身份赴日喀则与六世班禅喇嘛联络关系,以发展通商为借口,达到逐步渗透西藏的目的,最终达到建立西藏“缓冲国”的图谋。由于当时清朝政府还处在鼎盛时期,波格尔的要求遭到拒绝。可是,英国殖民者并不死心,1783年又派遣萨穆埃尔·特纳上尉和托马期·桑德斯前往日喀则,再次笼络达赖与班禅,结果仍然无功而返。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清政府日渐衰弱,英属印度总督寇松迫不及待地要进军西藏。但是,英国殖民军队遭到了三大寺喇嘛的激烈反抗无法得逞。寇松在屡次碰壁之后更加深知,西藏宗教势力强大,若要在西藏得到长久的利益和统治权,必须在西藏的上层宗教势力中寻找代理人。于是1904年英国人进入拉萨后,不断地与西藏宗教势力的上层分子接触,拉拢关系搞亲近活动。1908年9月,英国又派奥康诺与锡金王子做达赖十三世的工作。在英国人的百般利诱威逼下,西藏宗教的上层分子与英国人达成了某种妥协,使英国人在西藏取得了更多的利益。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还加紧了在西藏宗教势力中培养“亲英派”的活动,以期最终达到使西藏脱离中国的罪恶目的,真正成为英国殖民者理想中的“缓冲国”。

总的来说,英国人为达到控制统治西藏的目的,从宗教文化着手,拉拢西藏宗教上层分子培养“亲英派”的策略是成功的,“1910年2月达赖逃

亡印度,并请求英国殖民政府帮助他抵抗中国。达赖从原来的仇英到期望依赖英国来保持其在西藏的地位和权力,这便是一个明证。从此,英国对西藏的做法也从原来的武力征服转为利用达赖,策动西藏脱离中国,使之成为它控制下的‘半独立国家’”。^{[2](P24)}

印度独立后,对西藏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与策略也使尼赫鲁费尽了心机。按理,印度受了英国殖民者2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丧权辱国的艰难困苦时时袭击着他的心,他与印度的精英们更应懂得印度的独立自主比什么都重要。但是,独立后的印度尼赫鲁新政府的官僚们却一反常态,完全继承了英国殖民者在统治印度次大陆时的“霸主”心态和嘴脸,非但不平等地对待自己周围的弱小邻国,还颐指气使,剥夺和控制并吞周围弱小国家的主权与领土。他们不但兼并哲孟雄(锡金),^①还控制不丹,将尼泊尔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并还妄想再在中国的西藏问题上有所作为,以实现英国殖民者并未实现的把西藏变为“缓冲国”的企图,最终达到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的目的。但是,由于当时印度迫于刚独立时的国内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之后,印度政府不得不把自己的痴心妄想暂时掩盖起来。因为尼赫鲁及其精英们知道,鉴于当时印度的军事实力是无法征服中国的,倒不如先和中国搞好关系,迷惑对方,使中国新政府对印度丧失足够的警惕性,在这种时候再创造机会在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为印度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为此,尼赫鲁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与中国发展热烈的中印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则暗地里与中国较劲,实施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永久边界线的前进政策,持续不断地蚕食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领土。从尼赫鲁的言论看,他一面说“要把一个国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②与此同时,尼赫鲁及其精英们却背着中国政府,干有损

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事。当中国政府正忙于抗美援朝时,印度军队却在中印边界东段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1951年2月派兵占领了达旺地区;1953年至1954年印度军队继续北进,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土地,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1954年中,印度军队又占领了乌热、香扎和拉不底等土地。1957年占领了什普奇山口。1958年又占领了巨哇、曲惹。另外,印度政府迫不及待地修改地图,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全部属于中国的土地划入了印度的版图。印度军队还把中段占领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也划入了印度的版图。尼赫鲁还在1958年12月14日写信给周恩来,直接向中国提出这些土地的要求“印度的这些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只能属于印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2](P131)}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又继续步英国殖民者的后尘,利用印度宗教文化与西藏宗教文化的亲缘关系,抓紧做达赖的工作,鼓励他提出“西藏独立”。1956年11月,在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大会上,“印方只悬挂印度国旗和西藏佛教的旗帜,不挂中国国旗,许多印度报纸也只提印度、西藏‘两国’友好关系,不提中印两国友好关系。有的报纸还说,达赖、班禅来访,不仅有宗教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③并且在这次礼仪上抬高达赖,贬低班禅,想方设法使达赖留在印度的噶伦堡,以达到印度政府直接控制达赖的目的,并进一步煽动西藏宗教上层分子中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由于周恩来的劝说和各方面得力的工作,印度政府企图在大会上离间西藏与中国之间关系的阴谋未能得逞。不过此次达赖访问印度的教训,进一步清楚地说明印度政府企图谋求在西藏方面种种特权和利益的努力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更加露骨与肆无忌惮。事后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1958年,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某些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下,西藏一些宗教上层分子勾结外来势力,并唆使反动的大农奴主和不明真相的喇嘛与藏民,在印度噶伦堡成立的“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和“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的指挥下进行叛乱;还大力宣扬“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

等谬论。从此,印度的噶伦堡也就成了一些印度人煽动西藏叛乱的基地。

1959年3月10日,以噶伦堡为基地的少数西藏宗教上层分子果真发动了西藏的全面叛乱,他们还提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达赖也于1959年3月31日被西藏叛乱分子劫持到印度。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仅把“西藏叛乱”说成是“悲剧”,并还说“同情”西藏的农奴主,把农奴主的叛乱说成是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还强调所谓印度对西藏“宗教和文化联系”的“感情”,以此作为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2] (P136)}

正是由于尼赫鲁的这份“宗教与文化”的“感情”,西藏叛乱后,印度政府还大肆污蔑中国人民平定西藏叛乱与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是“压制自由”和“摧毁”宗教等等。

另外,从1959年2月开始,印度社会迎合国际上反华浪潮,在舆论上大肆发表围攻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文章。尼赫鲁非但佯作不知,还加紧了蓄意挑起更大的中印边界冲突的准备。那时中印边界摩擦不断,中印双方的边防军巡逻时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频繁发生,中印边界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国总理周恩来多次提出了中印边界和平解决的建议,可尼赫鲁却一再拒绝,并一反以往友好的态度,开始强调维护印度的“荣誉和尊严”,谴责中国的所谓“傲慢”与“侵略”。直到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公开向中国宣战,中印边界战争终于全面爆发。

尼赫鲁及其官员与某些国内舆论为何对西藏问题反应如此强烈,如果从文化角度探讨研究,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错误地认为“印度文化与西藏文化有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印度政府理应给予更加直接的关照。有的印度极右派人士甚至发表言论认为:印度文化为母,西藏文化为子,哪有母不格外关心子。为此,我们不但要对印度人这一心态加以重视,更要以历史与现实的事实给予说理驳斥,使之不能成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

三、冷战时期印度宗教文化的特点

当我在开始分析研究冷战时期印度宗教文化的特点与原因时,我自然想到了尼赫鲁外交中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这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印关系中印度宗教文化因素作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同时,也能使我们更深层次地领悟到文化无形而又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与力量。“不结盟”外交政策和“大印度联邦”的构想,都与印度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1. 尼赫鲁“不结盟”外交政策与印度宗教文化的关系

仔细研究尼赫鲁的一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有着一种常人难以达到的悟性,他把自己对印度文化的独到悟性巧妙地运用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大国关系的处理之中。“不结盟”也正是他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大手笔。“不结盟”在国际上体现了反对强权政治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它对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尼赫鲁本人也被誉为世界“不结盟”国家的领袖,印度的国际地位随之上升。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不结盟”的内容,然后再去解读它与印度文化及价值观的关系。“不结盟”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避免与任何国家或反对另一个国家的集团结盟,寻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二是不结盟并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也不是一种消极的政策,而是意味着在一国的外交政策中的独立自主(尼赫鲁曾在1958年12月对他的“不结盟”作进一步阐释说:不结盟不是一种消极的政策,而是一种积极的明确的政策,而是我希望是一种能动的政策)。三是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四是积极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际上这是1954年4月至6月,周恩来第二次访印度时与尼赫鲁商谈有关中印双方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联合声明的五项原则^④)。五是引进外援,只要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有利。

总体而言,“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体现了印度

文化价值观对政治、道德、民族、平等、正义、真、善、美等方面的认识。这其中有对物质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和非暴力价值的衡量标准。重精神价值的追求,强调用“法”去维护和创造某种和谐,用非暴力求得和平。

如果我们用印度佛教的“舜若多”(空)的哲理去分析的话(这一哲理也被印度教创始人商羯罗吸收发挥为“梵”和“幻”的论述),也可探寻到尼赫鲁“不结盟”思想形成的内核。“空”并不是“虚无”,“空”即是“有”、“空”即“不空”的辩证观点领悟得极为深刻。综观尼赫鲁的政治生涯,他待人处世始终贯穿着“不结盟”的观点。因为他认为,“不结盟”可以使自己处处主动,不受他人牵制,别人又少不了他。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从不拉帮结派,或者投入某一个人的怀抱,他总是游离在各政治派别之外,独自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也从不随意地支持某一个人或反对某一个人和派别。确实,尼赫鲁的所作所为为他的政治生涯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所有的人和派别都认为缺不了他,都要拉拢他,结果他成了在印度国民中除了圣雄甘地外最具权威和地位的风云人物。

所以,当尼赫鲁成了印度一国总理后,他自然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也遵循“不结盟”原则,这样可以使印度左右逢源,各取其利。尼赫鲁有一句名言,一语道出了他倡导“不结盟”的真正目的“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政策不是聪明的政策。”早在1949年8月17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时就阐明了“不结盟”的真正用意和目的。他说,不是通过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而是通过独立的态度对待各种有争议和争论的问题,印度要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靠不结盟保障国家的安全,而不是武力。为此,尼赫鲁不与美苏结盟,也不与美苏交恶,而是周旋于美苏之间,互不得罪,利用美苏都想得到印度的支持来达到目的。

的确,尼赫鲁的“不结盟”对外政策的实施,为印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印度在政治上不但得到美苏的承认,同时,在经济上也都得到了美苏援助和技术上的支持。根据1963年3月29日《时代周刊》的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62

年,印度从美国获得了39.52亿美元的援助,比参加美国军事集团同盟国的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得到的总和还多11%。1956—1963年,印度又从苏联得到了55亿卢比的经济援助;在当时来说,印度是苏联对外援助的最大受益国。

不过,我们在客观分析研究尼赫鲁的“不结盟”对外政策时,也不得不看到这样的事实:虽然不结盟维护了印度的独立性,维护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当时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是,遗憾的是,尼赫鲁在执行“不结盟”对外政策时,始终未放弃印度在美苏两大集团之外充当第三势力的领袖,争当“亚洲的轴心国”;始终不忘并努力实现自己“大印度联邦”的构想。所以,在南亚地区印度实施了“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这给“不结盟”蒙上了阴影,同时也说明尼赫鲁对印度文化及其价值观的领悟还是有缺陷的。

2. “大印度联邦”与印度文化圈

200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残酷统治与压榨,使印度民族所受的苦难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尼赫鲁及其政治精英们在忍受英国殖民者统治的耻辱和不幸时,他们这些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印度教婆罗门的后代,在为自己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骄傲时,又常常对西方文明表现出由衷的青睐。尼赫鲁及其精英们要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他们在痛恨英国人的骄横与傲慢的同时,却又十分钟情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留下的各种遗产。“大印度联邦”就是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留下的一大遗产,也是他们追逐与梦想成真的目标。

独立前,尼赫鲁早已存在着“大印度联邦”的构想,其地理位置包括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所有国家,还有中国的西藏地区和缅甸等区域。尼赫鲁甚至还划出了“大印度联邦”理想的边界线,即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内务防线,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区,将“麦克马洪线”、“约翰逊—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又将印缅边界至杜兰先之间的广大地区作为印度的“安全圈”。无疑,尼赫鲁早期构想的“大印度联邦”的边界线,正是受印度文化直接影响的区域,属印度文化圈内的国家与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大多属于印度教和佛

教文化影响的范畴,与印度文化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有的甚至有 70% 的人口信奉印度教,并把印度教定为国教。虽然,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其文化属性仍可归于印度文化之中。为此,印度独立之后的历届政府在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其对外政策时往往不同于他国,一般视其为印度的附属国,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置于直接掌控之下,稍不如意就横加干涉。如 1947 年刚刚独立的印度就迫使锡金签订了《维护现状协定》,并出动军队进入锡金,不过那时锡金叫哲孟雄,原是中国西藏政府的藩属。1950 年 12 月,印度又与锡金签订了《印锡和平条约》,规定锡金的首相必须由印度人担任,锡金变成了事实上的附属国。1950 年 8 月,印度又强迫不丹签订了《永久和平友好条约》,掠取了对不丹的外交控制权。尼赫鲁自然也不会忘记尼泊尔和斯里兰卡。1951 年通过尼泊尔宫廷的权力之争,印度乘机插手,从政治、经济上控制了尼泊尔。对中国的西藏地区,尼赫鲁企图继承英国人的特权,欲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政府先后发出 7 份照会和备忘录指责中国政府,最终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于 1962 年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继承了尼赫鲁对南亚诸国及周边邻国的外交政策,相继吞并了锡金,肢解了巴基斯坦,扶持东巴成立了孟加拉国,并又出兵斯里兰卡等。20 世纪 80 年代初,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试图脱离印度政府的控制,马上遭到印度政府愤怒的报复,封锁了尼泊尔经印度至加尔各答的出海通道,使得尼泊尔经济陷于瘫痪。最后尼泊尔不得不屈服于印度,签订了一系列“友好条约”。虽然拉奥、高达和瓦杰帕伊政府对南亚邻国的外交政策有所变化,但是他们仍要把南亚次大陆视作他人不可染指的势力范围,牢牢掌握在印度手中,只不过其外交政策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四、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在研究探讨了冷战时期与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现象及其特点和原因之后,若要再着重分析

研究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我们还必须研究分析印度宗教文化的核心要素在什么地方? 又有哪些特点? 这样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左右中印边界冲突爆发的真正的宗教文化因素。

在印度的宗教文化体系中,最能体现印度核心文化要素的是: 印度教教徒重精神轻物质。从某种角度讲,印度教教徒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较偏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其主要原因是宗教的作用与影响。印度教教徒不但一生下来就是个宗教徒,同时,从他下地的第一声啼哭起,就被浓重的宗教仪式、语言、精神所包围,他的一生从此总是脱离不了宗教的影响。人数众多的印度教教徒,他们成群结队,或者独自一人,要在临死前到印度教的圣城瓦腊纳西等死,死后在恒河边举行宗教仪式火化,并把骨灰抛进恒河后,方才终结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天堂过幸福生活,或者来世求得一个好的报应。所以,可以说印度教教徒没有宗教就无法生活。其他宗教教徒与印度教教徒也相差无几。自然,在这种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人,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要淡一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凡印度的宗教教徒在精神享受的追求方面格外强调人对神的奉献精神。尤其是印度教教徒,他们崇拜自己心目中的神,并全身心地奉献于它,这是他们最高的精神享受。因为,在印度教创立之前,佛教强调“业”因,人生人世间所有一切活动都叫“业”,亦叫“作业”。要摆脱“业”的包围与折磨,只有放弃工作,独自苦身修行,这是断绝“业”因的唯一的解脱之道。印度教是在吸取佛教教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更认为人一生所有的劳作,只要出离贪求,永远知足,并非是产生恶的“业”因,人只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奉献于它,他就不会沾染罪垢,反而能求得神的青睐。《薄伽梵歌》里有这样两段对人劳作的论述“一个人他的每一个动作不系于欲望的效果,他的业被智慧之火焚化掉了,智者称他为圣人,出离了世界的束缚,永远知足,不受拘束,虽然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完全没有业,不要希望什么控制着自己的心,出离了贪求,只用身体去工作,他就不沾罪垢。”^{[4] (P113)}“即使在战争中杀人,也不会沾染罪垢,因为,你要为作战而作

战,没有考虑到快乐与苦恼、丧失与得益、胜利和失败,你永远不会招致罪恶,因为这是你的奉献。”^{[5](P73)}所以,印度人认为,用忘我超脱的精神去忘我地工作,奉献自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最后让神行于自我,最终就能达到与神合一的最高境界。

尼赫鲁及其政治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是印度教教徒,从小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熏陶,他们为独立后的印度工作,忘我地为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去奋斗,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就不会沾染罪垢,这就是印度教教徒的行为之道。与此同时,印度人还认为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一个人为了子孙和国家、社会与民族的繁荣,而孜孜不倦去经营自己的人生,负担起家庭与国家的责任,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的得失去追求,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利欲享受去奋斗,而是在“达摩”(法)的约束下规范个人的行为得失,将自我无私地奉献于社会,这就是人的社会价值存在的真实体现。

另外,《薄伽梵歌》还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智慧之道”的重要性“因为世界上没有再比智慧之道能净化一切了,已经达到瑜伽完整境界的人,许多日以后,他便发现智慧在他自己之中,有信仰的人能控制他的感觉得到智慧,得到智慧之后,他立即达到至高水平。”^{[4](P113)}“智慧之道”在现代印度人的认识中是极为深刻的,一般有点知识的读书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掌握知识,开启自己的智慧之门,除了为自己寻求一个好的生存和工作环境外,更主要的是他们这是亲近神、与神合一的一种途径和方法”。^{[6](P17)}

久而久之,在上述印度宗教文化核心价值观与哲学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养成了印度民族极强的民族韧劲,而这样印度式的民族韧劲还带有一定的宗教性——神性。让神行于自我,全身心地工作,出离了贪求,忘我地奉献,甚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求达到人与神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印度教徒人生中最高的精神追求。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及其政治精英们看到的是英国人留下的一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他们要为穷困的印度迅速崛起与繁荣富强而奋斗。尼赫鲁私下曾再三强调“考虑任何问题首先得从印度的利益着眼,

其次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⑤

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尼赫鲁既不深入地去分析研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不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以及这个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患难与共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战友和同伴的思想观点与性格和愿望,更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本身。他的心中只有为了继承英国殖民者留下的遗产,去实现他建立“大印度联邦”的构想,把中国的西藏变成横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最大限度地满足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从而也以此提高新生印度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为此,他除了乘人之危不断地蚕食中国的领土外,又片面地修改地图,企图以既成事实逼中国承认印度认为的中印永久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与此同时,尼赫鲁及其同僚又一方面不择一切手段拉拢达赖,鼓励他进行西藏的独立活动;另一方面则玩弄两面手法迷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让他们在中印友好声中丧失应有的警惕性。

而中国方面,由于当时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中国人一般除了对印度的佛教及文化有所研究外,对于印度民族的特点及属性、印度文化与宗教性—神性关系方面的特点研究等都还几乎是模糊和空白的,所以,也就缺乏深入地研究印度的国大党及其领袖们的治国之策,以及对中印关系的真正图谋及影响。尤其对尼赫鲁个人的了解和研究,更是处在表面的初级阶段。如对于尼赫鲁个人的为人、脾性、爱好及其意志力和行为特点及思维特点等,了解甚少,难以理解;还片面地认为尼赫鲁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真诚友好的朋友,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中印关系上所做的另一面,盲目地相信他表面的演讲和承诺等。一旦中印关系的矛盾激化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则是根据中国文化的处世哲学,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没有从更长远和深层次上去研究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只是单单求得30年的和平而已;对其后果的危害性想得不多不深,缺乏应有的预见性,所以,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去考虑衡量决策的国际性并与国际惯例相符。

可是印度的领导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印同是

文明古国,印度也没有比中国差,古代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不少的推动作用。印度虽在中印边界战争中败给了中国,但是,印度绝不屈从中国人的安排。使吃了败仗的印度去乖乖地坐到谈判桌上接受中国人的教训与安排,他们认为这太丧失国格人格了。为此,印度不但不接受中国人和平谈判的要求和提议,更是不顾自己的伤痛,仍旧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继续占领中国军队为实现和平谈判主动后撤的中国领土。这就是印度民族属性韧劲的体现,也是尼赫鲁及其同僚为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目标的动力,因为这时神已行走于他们的心中,也是他们至高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印度宗教文化核心价值观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直接体现。

实际上,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虽然在军事上印度被中国打败了,但是,实际上印度却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如今,他们不但仍占据了中国的领土,顾及印度国家的体面和利益,不愿放弃占领的一寸中国领土。同时,印度还要中国人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理性。目前,中印边界谈判的实情足以说明,中国人在与印度人的和平谈判中,从中印文化的高度去探讨研究的话,中国与印度还是没有更好、更深层次地领悟中印核心文化的价值及精神方面的奥秘与真谛。

注释:

- ① 哲孟雄原是中国西藏的藩属,也是锡金的旧名。英国殖民时沦为英国殖民者的保护国。印度独立后,1949年6月2日向哲孟雄派驻军队,并接管了哲孟雄的一切政务,改名为锡金。
- ② 《西藏革命和尼赫鲁哲学》,《人民日报》1959年5月6日。
- ③ 《外交部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1年4月),第175页。
- ④ 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五项原则是:1.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被印度人称为“番查希拉”,意为中印关系的五项戒条,即:1. 不杀生; 2. 不偷盗; 3. 不邪淫; 4. 不诳语; 5. 不饮酒,神圣又至高无上。
- ⑤ Bhim Sandu, *Unresolved Conflict: China and India*, 1988, 第35页。

参考文献:

- [1] 赵蔚文. 印中关系风云录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0.
- [2] 王宏伟. 喜马拉雅山情结: 中印关系研究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8.
- [3] 任继愈. 宗教辞典 [R].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 [4] 糜文开. 印度教三大圣典 [Z].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1970.
- [5] 史华米巴, 布巴. 薄伽梵歌(原本) [Z]. 巴帝维丹达书籍信托出版社, 1981.
- [6] 吴永年. 大象、牛车、芯片的共鸣和神舞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Reflections on Religious Culture of the Sino – India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Period

WU Yongnian

(College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paper overviews the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ino – India relations and its changes in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religious cultur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s of religious culture of Sino – Indian border conflict are also explored.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a further conside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ino – India relations.

Key words: the Cold War period, China, India, religious culture, relation

(责任编辑: 申 浩)